

繁荣乡村文化 激活振兴动能

——乡村文化资源开发调查与思考

●黄振华 黄洪凯 刘少新 王建宏 张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以乡村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为前提。当前我国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状况如何，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有效提升乡村文化资源开发成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近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课题组联合《光明日报》对全国26省（区、市）119个村庄1785位村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当前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繁荣向好

红色文化有址可寻、有史可讲。“来到这里，可以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地了解党的革命历史，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重温峥嵘岁月。”陕西省榆林市杨家沟革命旧址前，来自重庆的游客卢祖安说。

红色文化是乡村文化资源的重要内容，对于乡村文化振兴意义重大。调查发现，在受访的119个村庄中，56个村庄拥有不同形式的红色文化资源。其中有47个村庄对本村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了开发利用，占比达83.90%。在这47个村庄中，所有村庄都建立了红色文化纪念馆、博物馆等展厅，21个村庄依托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主题村落名片，17个村庄通过拍摄红色文化短视频来传播本村红色文化。编著、出版红色文化历史作品以及排演红色歌舞剧的村庄分别有15个和9个。

将红色历史、红色教育、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既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又有助于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推动红色文化传承发展。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板寨村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拥有红七军板寨会师旧址、黎明关抗战遗址等红色资源。当地通过红色故事征文、党史文化相关文物征集，以及安排人员对板寨村老党员、老红军访谈等方式，搜集红色历史史料，发掘红色遗迹，开展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赓续红色血脉，讲好红色故事。在红七军板寨会师旧址参观的村民刘顺民说：“这里是当年红军首次进入贵州的地方，我经常来这转转，听讲解员讲红色历史。”

传统手工艺历久弥新。传统手工艺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推动传统手工艺开发利用，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匠心文脉的应有之义。调查发现，在119个村庄中，71个村庄保有传统手工艺资源。其中，46个村庄立足当地实际，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对传统手工艺资源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占比为64.79%。在1785位受访村民中，78.87%的村民反映当地传统手工艺资源开发成效“很好”，显示出传统工艺文化开发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是“中国四大古镇”之一，该镇木版年画享有中国民间艺术与古代印刷术“活化石”的美誉。木版年画手工制作要经过选料、绘制、刻版、印刷、晾画等工序，每到年关，需求量激增，木版年画制作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我们镇里成立了木版年画社和木版年画研究所，大家平时经常一起学习。靠出售木版年画，我每年增收2万多元。”村民姚世兰说。

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周城的璞真扎染博物馆里，染好的布料挂在屋顶随风摇曳，参观体验的游客络绎不绝。“我一直想来大理感受扎染传统

技艺，这里的氛围很好，老师傅们都有耐心。”正在体验扎染的游客卢轶说。扎染是白族群众的传统手工艺，“大理三千户，户户织布，家家有染缸。”周城村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染技艺，将“小手艺”做成了“大产业”。

乡村历史建筑异彩纷呈。“窑洞”“客家土楼”“侗族鼓楼”“傣族竹楼”……风格各异、独具特色的乡村历史建筑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我国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晶。调查发现，在119个村庄中，48个村庄保有不同类型的历史建筑。其中有37个村庄对当地历史建筑进行了开发利用，占比为77.08%。在已开发的村庄中，78.67%的村民反映当地历史建筑资源开发成效“很好”，表明当前乡村历史建筑开发利用程度较高。

“斟满了苗岭的沧桑，盛满了苗家的吉祥；伴着银铃银铃哟，飘着鼓点鼓点香嘢……”来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的人都会听到独具特色的拦门酒歌，感受苗寨对远方来客的热情欢迎。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地，吊脚楼依山错落、鳞次栉比，蕴含浓郁的民族风情。吊脚楼是一种木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由榫卯连接，不用一钉一铆。近年来，以吊脚楼为背景拍摄“苗疆”主题写真，成为游客的“打卡”必选项目。“在网上看到过好几次苗寨的风景视频，这次专程来体验风土人情，拍些漂亮的照片。”游客唐涛说，“坐在苗寨吊脚楼中，品尝这里的竹筒饭、腊肉香肠、手工糍粑，非常放松。”

乡村文化资源开发面临哪些困境

“我父亲那一辈还有做手工艺活谋生的，太脏太累又赚不到太多钱，我不想再做这个了。”“我们村重修老祠堂的时候，把不是危房的祠堂推倒重建，最后修了个‘四不像’”调研发现，乡村文化资源开发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困境，与繁荣乡村文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部分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风险。提高传承意愿是当前乡村手工艺资源开发面临的突出难题。调查发现，在71个拥有传统手工艺资源的村庄中，64个村庄反映当地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风险，占比高达90.14%。进一步调查显示，在1785位受访村民中，只有134位村民掌握了诸如竹编、造纸、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占比为7.51%。其中，104位村民表示“无人传承”是传统手工艺面临的重大问题，占比达77.61%。

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桑皮纸以桑树枝内皮为原料，先把桑树枝上的细碎枝条去除，留下中间的光树枝，再把树皮剥下来，经过浸泡、锅煮、捶捣、发酵、过滤、晾晒等工序制作而成。制作桑皮纸曾是维吾尔族群众养家糊口的技艺，代代相传。如今，因为缺乏市场需求，桑皮纸成本较高，市场竞争力较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普恰克其乡布达村桑皮纸一条街的一位商户说：“很多制作

桑皮纸的匠人都转行了，后代也没有继承这门技艺。”

有些乡村历史建筑重开发轻保护。过度冷清和过度开发都不利于乡村历史建筑的传承和保护。调查发现，在拥有历史建筑资源的48个村庄中，35个村的负责人反映当地存在“只开发不保护”“开发前缺乏科学规划和论证”“开发过程中保护意识不足”等问题，表明乡村历史建筑资源保护力度不足。

一方面，一些乡村历史建筑无人问津，现状堪忧。重庆市巫溪县宁厂古镇拥有上千年制盐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如今千年古遗址出现大面积的青苔和裂痕。“这里没通火车，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也很少有外面的人来旅游。”当地村民张德英告诉调研组。缺乏产业和人气支撑，古镇长期得不到修缮，有着浓郁巴渝特色的历史建筑开始出现损毁现象。

另一方面，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历史建筑开发过度，同样对建筑的传承保护带来不利影响。客家土楼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洪坑村从大山深处走向世界舞台。工艺精巧的土楼建筑吸引了国内外大批游客前来参观游玩，“看了电影《大鱼海棠》就来这里的冲动，土楼群建筑令人震撼，不过感觉商业化挺严重的。”来自河北的游客王东说。土木结构难以承受过量的游客，一些土楼出现了土坯掉落的情况。

影响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深层次原因

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意识不强。古建筑、革命旧址、历史遗迹等文化资源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再生的特性，有效的保护是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前提。然而，很多村民缺乏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意识，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现实挑战。

“村里的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不了解什么是文化资源，也缺乏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的意识。”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竹海镇永江村小组组长韦成连表示。在1785位村民中，很多人表示“不愿意从事本地文化资源开发保护相关工作”。

调查还发现，1023位村民认为“从事文化资源开发的收益较少且不稳定”，占农户总数的57.31%。湖北省随州市广水市马坪镇狮子岗村月光茶园工作人员杜晓红说：“附近村子主要通过种植、务工等获得收入，个人和村集体一般没有开发乡村文化资源的想法。”

文化资源开发缺乏专业人才支撑。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大量的实践经验做支撑，调研中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并不具备相关人才。

“皮影戏是我们这边的特色，来看的外地人不少，但自己没制作和表演过，也没啥兴趣去学。”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柳枝镇张桥村村民李建国说。陕西省渭南市华县（今华州区）皮影戏以“碗碗腔”为主，被誉为“中华一绝”，如今面临人才不足、发展缓慢的难题。调查发现，在119个村庄中，83个村庄的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是本地政府和村庄讨论后形成的开发方案，缺少专业机构参与。

汉天一秋。

清乾隆进士黄恩锡的《澜沧杂忆词》记录了金江古渡一带的美食细鳞鱼，前人誉称“状如松江之鲈”。当地清酒用高粱酿成，有着特殊的醇香味。游人至此，每每沽酒买鱼，登楼望江而饮：

金沙三面抱江流，

春水晴波好泛舟。

街约鲈鱼新出水，

捉壶人上倚江楼。

20世纪60年代初，大理州宾川县至永胜县的公路通车，金江古渡的行船日渐减少。至于江上清声、中天明月、薄暮红霞、金江雁字等名胜依然不减当年。如今，金沙江中游鲁地拉水电站建成，金江古渡上下形成高峡平湖美景。电站库区主体位于涛源镇，向北延至太极江湾，水域面积接近程海。站在观景台，只见：金江大桥横跨南北，湖岸村镇风光如画。涛源堡子坪大龙潭，湿地稻田延至江湾。有望打造湿地公园成为康养休闲胜地。

永胜县金江古渡已被纳入长江航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太极、涛源、汇源等水运码头和若干停靠点先后建成。大理州宾川县至永胜县、宁蒗县的高速公路建成，与丽（江）攀（枝花）高速公路在永北镇交汇，鸡足山、革囊渡、程海湖、泸沽湖、玉龙山、攀枝花等沿途风景名胜景区逐步联动发展，形成全域旅游大格局。

强人民群众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二是要让乡村文化资源创造更高附加值。一方面，应主动梳理本地乡村文化资源的遗存情况，建立乡村文化清单目录。同时，积极通过平台联名、线上直播、短视频、海报宣传等方式激活本地文化资源的市场价值，调动当地村民参与文化资源开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凸显本地文化资源地域特色，将当地特色文化、生活方式、民俗风情等融入文创产品中，提升当地乡村文化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

传承乡村文化，既要强化专业指导，又要推进文化人才培养。一是积极开展专业培训。组织当地优秀师资或聘请专业人才对乡村干部进行专业培训，举办民俗文​​化传承交流会，提高乡村干部群众的文化知识和技能储备。同时，构建省、市、县、乡四级文化保护工作人才体系，提高非遗传承人、文化工作者、文化工匠的待遇，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其中。二是主动寻求社会力量合作。多渠道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文化社会培训机构的联系，引进、留住懂文化、爱乡村、善规划的专业性人才，听取专业人士对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建议。结合当地文化特色，积极与非遗保护中心、文化旅游设计规划院等机构合作，强化专业指导，推动社会多方力量开展乡村文化合作，不断优化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形式，提升开发效能。

发展乡村文化，既要加大资金支持，又要确保文化开发持续性。一是争取专项资金，夯实物质基础。各级地方政府应提高文化建设的资金预算，设立乡村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专项资金，将资金用于属地乡村文化资源开发建设。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文化发展基金，加强对欠发达地区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物质支持，提高文化传承人的传承补助经费。二是强化经费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村庄在开发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应做好宣传工作，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的资金投入机制，强化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管理。

支持和鼓励乡村文化“走出去”，引导村民参与进来，实行以奖代补的方式鼓励村民参加各种展演活动，提高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原载《光明日报》8月22日第七版。课题组成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黄振华 黄洪凯 刘少新 《光明日报》记者 王建宏 张锐）

打猪草

●陆春旺(永胜县)

小时候，除了读书，我还会干许多力所能及的活儿，比如，砍柴、捡粪、割草。其中，要数打猪草最多。

那时候，老家的农户都养猪，少则两三头，多则10多头，为的是卖猪仔、肥猪换钱。更重要的是，年底宰年猪后，一家人才有猪肉吃。而绝大部分人家的米糠、麦麸不够喂养猪，得靠青饲料。孩子们放学或放假后，大都去打猪草。

夏秋之际，下午到学校上学时，我们就背一只空篮子到学校。等到放学的钟声一响，便与原先约好的几个小伙伴前往学校附近的庄稼地里找猪草。抓紧时间扯了一大篮后，在水沟里清洗干净。如果时间还早，我们就把陀螺拿出来玩一会儿，或掏出几个核桃打几盘“码子”，然后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同学们都找猪草，致使学校附近地里的猪草越来越少，不得不到稍微远一点的大山上去找“山猪食”。我们主要去学校西边后山上叫“二夹林子”“锅盖山”“小背远山”的密林里去找“麻玉毫杆”“老鼠尾巴根”“老来嫩”等上好的“山猪食”。如果时间还早，我们就去远一点的高寨、岩根一带的洋芋、芥子地里或荒坡上找常见的“野辣子”“酸草

子”等。

到山上找猪草，虽然路途遥远艰险，但猪草非常多，到处都长得密密麻麻的，只要下到地里，不用一会儿，每一个人就可背满满的一大篮。找好猪草后，我们背着沉重的篮子，汗流浹背地往家里赶。

暑假，如果生产队里没有什么农活，小伙伴们便会在村子四周的地里去找猪草，但大部分时间，大家都顺着大河一直走到坝子东南面的地里去。猪草的根部泥巴太多，找够后要用水洗了再背回家，以减轻重量。

我们还会去洲城打猪草。那里的许多土地沙石裸露，荆棘遍地、杂草丛生，而“酸草子”“野辣子”不但长得多，而且很深。为了解决运力不够的问题，几个要好的伙伴一大早就推上“鸡工车”赶往地里，直接用镰刀割猪草，然后，饥肠辘辘、大汗淋漓地推着满满猪草的“车子”回家……

打猪草早已离我远去。然而，流逝的岁月让我为穷困的家庭作出了一份贡献，使我从小懂得生活的艰辛与不易。每每想起那些打猪草的往事，时常会令我激动、回味与追忆……

漫话永胜金江古渡

●何守伦(昆明市)

永胜金江古渡位于涛源镇与片角镇之间，自古为长江上游交通要津。清乾隆《永北府志》序称，永郡“金沙环绕，诸葛相之所逮津；玉斧森沉，元世祖于焉飞渡”。

据云南文化名家袁嘉谷先生考证，诸葛亮“五月渡泸”的地点在永胜县金江古渡。他在《五月渡泸考》中说，蜀汉武侯南征，先至越嶲，“越嶲今属蜀，古兼夷滇之永北（今永胜）”，“捩理而决之，由越嶲至益州（今滇中），必经永北金沙江，江广而郁；揆势而决之，元世祖从中道入滇，革囊济金沙，顾祖禹所谓从越嶲渡江，未尝不师武侯之成法；揆时而决之，蜀都至永北，地望准直，约二千里，永北至益州治（今昆明），又约千里”。“侯由越嶲始渡泸，泸即永北界之金沙江无疑”。

南宋末年，蒙古军奔袭南宋后方，分3路自北而来，革囊渡江攻取大理。忽必烈率领中路军，在今玉龙县奉科镇渡江，还有部分则在永胜县涛源镇渡金沙江后攻占大理国。元代不仅在今永胜县设置北胜州（府），还在驻军之地设置永宁州，“永北”“永胜”之名均源于此。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派傅友德、沐英、蓝玉统率30万大军平定云南，继平定曲靖、昆明、大理等地后，又“平蒙化府、邓川州，破佛光寨，过金沙江，攻北胜府（今永胜），擒其平章高生，复平丽江（路）巨津等州”。次年三

月，朱元璋谕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北胜府乃明军“控制要害”之地，留下不少汉族军士戍守。

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沐英之子沐春奏准在今永胜县设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原驻昆明的云南中卫数千官兵调卫北胜州，担负守卫和屯田任务，此举称为“洪武调卫”。在今永胜县涛源镇设置陶奢百户厅，并设官方驿站“金沙江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驿传”。涛源旧称陶营，即因澜沧卫设陶奢伍于此而得名。

自明代至民国时期，在永胜县涛源镇先后设有金江巡检司、金江知事厅、金江县佐等。金江渡口的船只牢固宽大，雇用的人役健壮稳定，并有固定资产作为经费，故被称为“官渡”。年深月久，屯垦军户、行商小贩、手工业者八方聚集，金江古渡街市兴起，成为商贾辐辏之地。正如清代杨瑛《金江晚渡》中云：

金江渡水浩无边，

过客停车欲济川。

最是晚来堪画处，

隔江争唤渡人船。

在金江古渡望江楼上，历代题咏甚多。清初郡人陈锡祚的《登江楼》诗云：地暖常如夏，乘凉上小楼。江山千里外，



刊头摄影 老和